

张红娟

著

转首关河气象新

1949年—1955年华东地区小说研究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张红娟 著

转首关河气象新

1949年—1955年华东地区小说研究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 芜湖 ·

责任编辑：盛 夏

装帧设计：任 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转首关河气象新：1949年—1955年华东地区小说研究 / 张红娟著. —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8

ISBN 978-7-5676-3077-2

I. ①转… II. ①张… III. ①当代文学—小说研究—华东地区—1949—1955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89902号

ZHUAN SHOU GUANHE QIXIANG XIN

转首关河气象新

1949 NIAN—1955 NIAN HUADONG DIQU XIAOSHUO YANJIU

1949年—1955年华东地区小说研究

张红娟 著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3883578 5910327 5910310(传真) E-mail: asdcbsfxb@126.com

印 刷：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2017年8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00 mm × 1 000 mm 1/16

印 张：11.5

字 数：220千字

书 号：ISBN 978-7-5676-3077-2

定 价：32.00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国家认同意识和地方色彩	1
第一节 华东地区小说中的国家认同意识	1
一、国家认同意识的表现	1
二、移风易俗和历史记忆	4
第二节 华东地区小说中的地方色彩	7
一、自然景物的描写	7
二、风俗画的展示	10
三、淳朴的风情	13
第二章 战争小说和侦探小说论析	16
第一节 战争小说	16
一、苏联战争小说的译介	16
二、政府的号召	18
三、国际情怀的书写	19
四、战争传奇的叙事矛盾	20
五、战争中的人情、人性	23
第二节 侦探小说	26
一、侦探小说的生存环境	26
二、苏联侦探小说的影响	29
三、创作目的、内容、地方特色	30
第三章 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论析	37
第一节 女性身份的重新建构	38
一、弃妇的新出路	38
二、寡妇的新生	44
三、姑娘和年轻媳妇们的蓬勃朝气	48
四、老年妇女的“落后”	51
第二节 “男女都一样”的乌托邦想象	53

一、妇女解放的路径	53
二、“男女都一样”的书写悖论	55
三、伪女性化书写的当下面相	57
第四章 短篇小说的结构及其转型	60
第一节 短篇小说的结构	62
一、场景式小说的结构	62
二、孤胆冒险式小说的结构	63
三、对话式小说的结构	64
四、抒情式小说的结构	66
五、长篇短制现象	68
第二节 短篇小说结构的转型	70
一、情节结构的强化	70
二、时空安排的变化	72
三、美好的结局	72
第五章 小说的审美特征	75
第一节 明朗的审美特征	75
一、由暴露到歌颂	75
二、明朗的色彩	80
第二节 稚拙的审美特征	83
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方式	84
二、情节的人为化痕迹	85
三、语言的感情色彩	86
四、创作主体的局限	90
第三节 幽默的审美特征	92
一、幽默的表达方式	92
二、幽默在叙事中的功能	98
第四节 沉雄悲凉的审美特征	104
一、不屈不挠的沉雄之美	104
二、坚强柔弱的悲凉之美	105

第六章 地方的言说方式	107
第一节 方言词汇论析	107
一、方言名词	107
二、方言形容词	111
三、方言动词	117
第二节 方言进入小说的策略	119
一、方言注释的历史语境	120
二、方言注释的形式	122
三、方言注释的当下意义	129
第七章 俗语和歇后语论析	135
第一节 俗语论析	135
一、俗语的运用	135
二、俗语的叙事功能	147
第二节 歇后语论析	152
一、歇后语的运用	153
二、歇后语的叙事功能	157
附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华东地区部分小说创作者简介	161
阅读型参考文献	172
后 记	174

第一章 国家认同意识和地方色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初步完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其中,小说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它能利用文学感染力引导、教育读者,增强人们的国家认同意识。相对于国家这一“想象的共同体”,华东地区小说还具有其地方性,地方风景、风俗和风情画显现出华东地区的地方色彩。国家意识和地方色彩并存于20世纪50年代的华东地区小说中。

第一节 华东地区小说中的国家认同意识

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中,国家认同意识是很重要的内容。国家认同包含政治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等,主要在心理上影响国家公民,引导他们培养这方面的意识。创作主体对时代也做出了自己的反应,这里借用日本学者柄谷行人的理论进行观照。柄谷行人认为任何主体性都不是先天存在的,它是在后来的世界中不断被发展丰富的。这个被建构起来的主体,在面对世界时,就会在已被装置的框架内观察世界,自动过滤,习焉不察。

一、国家认同意识的表现

1949年—1955年,华东地区的小说创作者分别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解放区和国统区,前者的国家认同意识相比于后者要强烈很多。因此,在对后者主体性进行丰富发展时,各级部门做了许多工作,努力提升他们的国家认同意识,最终保留了具有基本国家认同意识的创作主体。这一部分人和来自解放区的创作主体一起组成了华东地区的创作主体队伍。同时,他们积极培养工农兵创作者,并和工农兵创作者一起在有关部门的指导下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创作。国家认同意识经过创作主体的笔进入小说世界中。

在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中,一批“新人”积极顺应时代,体现出强烈的国家认同意识。“新人”基本上都是青年人,他们求新求异、富有好奇心、适应速度快、积极拥抱新事物,在革故鼎新之际,常常走在时代的前列。这些“新人”有的是干部,有的是普通的工人、农民,他们都为国家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华东地区小说创作者及时捕捉到了这一现象,在“新人”形象的塑造中显示出了国家认同意识,体现出了对新生共和国的认同感。“新人”在工作中也不是

一帆风顺的，他们会遇到各种困难。小说中，农民积极分子王冬生为了集体的利益操劳，他用行动改变了具有私心的父亲，他带领群众斗垮了地主、富农的阴谋，最终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青年纺织女工古小菊热爱本职工作，积极克服困难，提高产量，但是同事们误解了她，消除误会后，古小菊和大家一起努力工作，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这些“新人”都热爱祖国，热爱生活，大公无私。小说描写他们在工农业战线上奋发向上的身影，体现出自豪的国家主人公意识。

华东地区小说的国家认同意识表现在对国家政策具象化的描写中。小说对积极参加运动、维护国家政策、响应政府号召的人物都持肯定态度；对抵制国家政策的人物，小说都派给他们一个反面的身份。小说大多以农村发展历程作为背景展开故事情节，比如土地改革（土改）、互助组、合作社、统购粮等名词经常在小说中出现。《土地》记叙了土改工作队在江南地区斜桥全区进行工作的情况：土改工作队队员李明被分配到黄墩村工作，他联系当地民兵积极分子葛长林、周雪珍、周德才等人，和抵制土改的各种恶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李明带领大家斗垮了以俞有升、张祺宝为代表的地主反革命势力，农民分到了土地，翻身做了主人。《秋收之后》描写了秋收之后的收购粮食运动，社长苏长华团结支持国家购粮政策的人，与张宗英等落后分子、陈福如等地主分子进行艰苦的斗争，最终完成了收购粮食任务。小说创作者把国家政策、政府号召融入作品中，形象地描写出相应的国家政策、政府号召给老百姓带来的好处，让读者在阅读中体会到国家对民众利益的关心，增强读者的国家认同意识。

华东地区小说的国家认同意识还表现在身份认同上。在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个人渐渐被纳入集体之中，他们不仅仅是家族中的成员，还是国家的公民。小说《活人塘》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薛陆氏是一个普通的农妇，在国民党士兵的逼迫下，挖坑活埋了负伤的革命战士刘根生，国民党士兵威胁薛陆氏不准救刘根生。薛陆氏对自己挖坑一事非常自责，为了营救革命战士，决定用自己身受重伤的小女儿七月子替换刘根生。在替换之时，薛陆氏肝肠寸断，抱着女儿不忍放手，但为了救革命战士，薛陆氏还是将亲情放在一边，救助了刘根生，让负伤的刘根生乔装成七月子，以卧病在床的方式掩盖伤情。小说描写出在崇高的事业面前，个人应该以革命利益为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突破狭隘的血缘关系。这是对血缘以及以血缘为支撑的家族关系的冲击。这种冲击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中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为它能将人从血缘、家族中解放出来，成为现代国家的公民。进入和平年代后，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出现了新内容。为了国家建设，年轻人可能会离开父母，不能在膝前尽孝，这和“父母在，不远游”的传统观念不

相符。小说形象地刻画出了这一矛盾。《父子之情》中，儿子高启明在城里机器厂当钳工，三个月没回过家。高启明告诉父母他在某天会回家，可是到了这一天，高启明还是没有回来。高隆昌气愤之下，到城里去找儿子兴师问罪。到了厂里，高隆昌得知儿子正在帮厂里准备庆祝大会，在现实教育下，高隆昌理解了儿子。在理解儿子之前，高隆昌对儿子几个月不回家的行为充满了愤怒，这是由于从血缘关系看问题，儿子是他的儿子，和他人无关。在理解儿子之后，他反而劝儿子不要送他回家，要以工厂里的事情为重。此时，他已经从血缘关系的死胡同里走出来了，认同高启明不仅是他的儿子，而且还是集体的一员。在个人和集体面前，高隆昌认识到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当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冲突时，集体利益应该放在第一位。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需要生活在其中的每个公民都能意识到自己和国家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小说中的人物不再仅仅是家族中的一员，他们更是国家成员，尤其是年轻人，他们常常会舍小家，顾大家。作为拘囿于华东地区一隅的老年人，他们的视野没有年轻人开阔，往往会阻碍年轻人的追求。此时的小说就体现出对老年人的形象化的否定，表现了小说具有国家认同的倾向。当然，小说中的老年人经过别人的开导最终都能理解年轻人的选择。正面人物的国家认同意识易于对读者产生教育作用，有利于增强读者的国家认同意识。

华东地区小说中的国家认同意识还表现在对敌斗争中。环境越是险恶，敌人越是凶残，就越能显示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不易，小说就越能教育民众要珍惜胜利果实。小说《红日》中，是这样描写孟良崮地势险要的：“他觉得这个山峰的长相很怪，怪得象一个莫大的碾盘。对整个的山来说，这个碾盘一样的崮是山峰，矗立在云端里，崮的本身却又是一块平原，有些地方生长着一些浅草，西北角上的一处，很象他的南京公馆里的那个草坪。自然，它不及公馆草坪那么平坦，上面有些凸起的石块。……还使他感到有趣的，是孟良崮的山势陡险，两面是悬崖绝壁，悬崖绝壁的缝隙里竟伸出几棵小小的马尾松来，象伞似的；另外两面，一面是个陡坡，陡坡下面是一条屋脊似的山岭；一面是比较平坦的斜坡，坡上有一条隐隐的极少有人走过的小路，路两边是犬牙交错的石块，石块和石块中间，生长着一些野草杂木。”^①双方经过激战，共产党军队为了人民的幸福，历尽艰险，才攻占了孟良崮。对敌人顽强斗争的原因在于共产党军队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正是凭着这种信念，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战胜了敌人，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① 吴强. 红日[M].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1: 371.

国。小说形象地告诉读者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应该珍惜胜利果实。敌人机关算尽，在人民群众的包围下还是落得失败的下场，体现出人民对现有政权的拥护。小说以敌人的失败显示出人民政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增强读者的国家认同意识。

国家认同意识的提升某种程度上来自权利的获得。国家如果能给生活在其中的人以尊严感，就有可能增强人们的国家认同意识，反之国家认同意识就会变得淡薄。人的权利有消极的权利和积极的权利。消极的权利指法律法规规定的公民享有的权利，积极的权利指以某种方式得到帮助的权利。积极的权利需要各级执政机关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积极有为，不能消极怠政。20世纪50年代，社会阶层处于变动之中，一些社会底层的人获得了翻身的机会，但是如果没有外力帮助，他们就不太可能获得应有的权利。此时，政府部门积极参与，让他们真正获得了解放，获得了公平的对待，他们的权利得到了保证，他们对国家的认同感也会由此而提升。此时的华东地区小说描写了被压迫者翻身做主人的欣喜。比如，寡妇在以往是没有社会地位的，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们获得了新生。当然，被压迫者获得权利的过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常常会遭到各种旧势力的阻挠，在政府部门以及各级干部的帮助下，最终，她们获得了自己应有的权利。《寡妇》中的刘白霞二十三岁开始守寡，领着女儿桃儿过日子，她爹刘老董不准女儿改嫁。荣誉军人赵四海并不是刘白霞所在村子的人，转业到这个村子后，住在了刘白霞的隔壁，他们在相互照顾中产生了感情。妇女会主任周玉花和村长有意撮合他们俩，但刘老董坚决反对。在周玉花和村长劝说无果的情况下，周玉花明确告诉刘老董，他无权阻拦女儿的婚事，刘白霞是一个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人，改嫁与否，这是她自己的事情，谁也不能干涉她的自由，这是政府的法令规定的。最终，刘白霞和赵四海喜结良缘。刘老董也想通了，出席了女儿的婚礼。刘白霞能获得幸福的生活，完全是有了国家法令的支持。个人权利的获得体现了社会的公平，一个公平的国家，能让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具有安全感，人们对国家的认同感就会增加。小说运用想象的方式表现了这一公平，激发人们对国家的热爱之情。

二、移风易俗和历史记忆

移风易俗也是增强国家认同意识的途径之一。由于华东地区某些地域的闭塞，有些风俗不能适应时代的进步。华东地区小说形象地描写了与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相悖的风俗。《滨海新纪事》提到了“寻野食”的地方风俗。李同志拿到工作介绍信后，王秘书提醒她，“……滨海是个怪地方，人家都说滨海的女人不大

规矩……”^①。不少人也告诉她，“滨海这地方风气太坏了，女人十个有九个寻野食……”^②李同志一路看到的都是贫瘠落后、污秽不堪的景象。“这是个沿海污秽的小港，狭窄的短短的小街开设着几家鱼行，沿港泊着捕鱼的海船，满街水沟道里浮着鱼鳞片，到处腾出带点腐烂的鱼腥臭。”^③在这贫穷落后的地方，有些女人为了生活，只能通过“寻野食”来养活自己和家庭。王二嫂，原名王春喜，死了丈夫，被李霸强行霸占，常常有人在她家喝酒胡闹。在李同志的帮助下，王二嫂勇敢地 and 恶霸李霸斩断不清不白的关系，不再靠“寻野食”养活自己和女儿，嫁给自己喜爱的吴阿林后，开始了新的生活。当地的风气也得到改善，村里的妇女都组织起来了，展开生产劳动，自力更生，“寻野食”的风气逐渐得到扭转。风俗的改变让妇女获得了做人的尊严，成为新时代的公民。

小说中对历史记忆的描绘同样也可以增强国家认同意识。历史记忆可以是辉煌的，也可以是悲惨的。辉煌过去能振奋人心，悲惨过去能使人警醒，这都对形成国家认同意识产生了一定的作用。有的小说家形象地描写出过去的苦难岁月。欧阳凡海的《无辜者》记述了抗战时期普通老百姓的苦难生活。主人公鄯蓝本是一位知识女性，战争让她变得一无所有，为了生存不得不成为妓女。王二因伤住院，医院中的景象触目惊心，就是人间地狱。医院病房分为不同等级，上等病房的景象尚且如此，其他等级的病房可想而知。“因为这是比较上等的病房，所以病人们都能睡在木板床上。除了几个发肿的病人之外，其余的病人全体骨瘦如柴，形同骷髅，包着一层黑而脏的皮膚，而这一层黑而脏的皮膚上又大半生有疥疮。恶臭从他们的铺位中散发出来，地上满是垃圾，呕吐出来的胃水，痰，和疮痂血浓。苍蝇以惊人的数量成群结队的奔来袭去，激起病人的咒骂。臭虫和虱子在病人的衣服上公行无忌，而那些衣服则发出浓烈的酸臭，其中最清洁的衣服呈黄污色，差一点的在黄污中带着灰黑色斑块，再差一点的就简直是一片墨绿色了。没有人能够明白，为什么这么大的病房只开两扇窗户。窗户都开在一边，开得很高，要站在床板上才能望得出去。每窗都有两扇粗重的窗门，都挂着两把大锁，和房门一样，是准备晚上也下锁的。即使在白天，两扇窗户打开，光线都很不够，空气也因为两扇窗子是开在一边，自然也不大流通，加上这是没有楼的平房，房顶就是一层瓦，所以就是在秋凉的时光，下午仍然热得闷人，到了晚上，

① 方膺. 滨海新纪事[J]. 小说, 1950, 4(1): 85.

② 方膺. 滨海新纪事[J]. 小说, 1950, 4(1): 85.

③ 方膺. 滨海新纪事[J]. 小说, 1950, 4(1): 86.

门子和窗子一齐锁上，这病房内的空气是一股什么味道，……”^①人们在生死线上挣扎，看不到出路。这样的社会是非人的社会，人的基本生存权利都无法得到保证，他们怎么可能认同这样的国家？这一类对过去苦难的回忆，能有效激起人们对新生共和国的热爱，培养和巩固人们的国家认同意识。

和描写惨烈的过去不同，有的回忆在小说中显得激荡人心。小说描写了为了广大民众的幸福，无数仁人志士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故事。小说的国家认同意识在对过去的回忆中得以呈现。谢大娘的儿子小黑子是保田队队长，小黑子让母亲帮忙在突击队和还乡团把持的庄子里散发传单。突击队和还乡团发现传单后，想逼谢大娘交代传单的来历和小黑子所在的地点，让小黑子回来投降。谢大娘义正词严地拒绝了罗文虎和武安义的要求，罗文虎等人对谢大娘施以酷刑。“李长恩和几个大兵，一下把谢大娘按倒，光脊梁贴到凳子上，肉烙得吱吱叫，油烟直冒，臭气直冲。谢大娘疼的钻心透骨，大叫了一声：‘黑子，给娘报仇啊！’就昏迷了过去，大兵把谢大娘拉起来，皮都粘到了凳子上，整个脊梁露着鲜红红的肉，燎浆泡直鼓起来，一个个像水泡子。”^②这种酷刑让敌方突击队的的一个十五岁的小兵吓得闭上了眼睛，手中的枪也拿不稳了。罗文虎命人用凉水泼醒谢大娘后，问庄上有谁和八路军相通，谢大娘英勇不屈，“‘呸’，谢大娘一口痰吐到文虎胖脸上，嘶着嗓子大骂：‘趁早收了你那副婊子脸，老娘就是铁打的。老娘死了，有人给老娘报仇，看你们这些龟孙子能活几天？到头总得千刀杀，万刀剐。’文虎擦着脸上痰，气的张嘴瞪眼：‘叫她翻身，奶奶个屁，叫她凳子上翻身！’谢大娘的前胸又贴到通红的凳子上，凳子又吱吱叫起来，只见她浑身乱颤一阵子，就不动弹了。”^③谢大娘不被敌人的淫威所吓倒，她不仅支持儿子从事革命活动，自己也积极参与其中。在遭到敌人的严刑拷打时，她没有屈服，相信儿子终有一天会为自己报仇，对革命充满必胜的信念。她和儿子所做的一切都不是出于一己私利，而是为了被压迫的大众的利益，为此她甘愿献出生命，这是大公无私的精神。小说刻画出广大人民群众英勇无畏的气概、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以及高度集体主义的情怀，对读者起到教育作用。小说以这些精神熏陶读者的心灵世界，激发他们对自己的国家产生认同意识。小说高度弘扬这些精神气质，正是希望这些精神气质能成为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的精神资源。

为了对国家认同意识的形成产生促进作用，小说常会运用象征、对比等手法

① 欧阳凡海. 无辜者[M]. 上海: 海燕书店, 1950: 330.

② 杨丹平, 戴石明. 乌云遮不住太阳[M]. 上海: 新文艺出版社, 1952: 118-119.

③ 杨丹平, 戴石明. 乌云遮不住太阳[M]. 上海: 新文艺出版社, 1952: 118-119.

进行叙事。(这些手法在本书第五章中有详细论述,此处从略。)通过运用这些写作手法,华东地区小说体现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好,达到对人民群众的教育作用,提升他们的国家认同意识。

第二节 华东地区小说中的地方色彩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富有地方色彩的小说更容易引起读者的注意。赫姆林·加兰认为:“艺术的地方色彩是文学的生命力的源泉。是文学一向独具的特点。地方色彩可以比作一个人无穷地、不断地涌现出来的魅力。我们首先对差别发生兴趣;雷同从来不能那样吸引我们,不能象差别那样有刺激性,那样令人鼓舞。如果文学只是或主要是雷同,文学就要毁灭了。”^①这段言论显示出地方色彩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20世纪50年代的华东地区小说展现了该地区的地方特色,其鲜明的地域色彩大多得益于对风景、风俗、风情的描写。

一、自然景物的描写

当自然景物和人混淆不清时,自然景物处于自在的生存状态。只有当人开始欣赏自然景物,自然景物才和人分离,作为人的欣赏对象而存在。人将自我对象化,自然景物成为人的外化物,此时,风景才产生出来。华东地区的山山水水无言地存在在那里,当地的人可能熟视无睹,自然景物就不会成为风景。现实生活中,如果小说创作者对这些自然景物也是司空见惯,它们进入作品的可能性就会很小,小说里的景物描写就会消失,人物只能在相对单调的空间里行动。当然,自然景物进入小说,也不一定就会成为风景,但对于意识到它的读者来说,它就是风景。华东地区小说里独特的自然环境,易于引起读者的好奇心而去关注它,便成了风景。这些风景有时烘托人物、渲染环境、推动情节,有时也为自己争取到独立存在的价值,成为地方色彩的组成部分。华东地区小说里的风景描写主要包括地形地貌、动植物和天气情况等。

华东地区自然风光如诗如画,进入小说中的风景经过语言的描绘,显出迷人的姿态。利明的《警惕》描写出了山区月夜的宁静美好,月光明亮的晚上,村里的人都睡熟了,树上的猫头鹰不时传来怪叫,洁白的月亮从山背后露出半个圆脸来,照得水田好像镜子一样光亮:房屋、道路都看得很清楚。小说以猫头鹰的叫声反衬出月夜山区的静谧,皎洁的月色烘托出山区澄明的景致,月夜的山区宁静

^① 刘保端,等.美国作家论文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84-85.

美好。山区的傍晚与月夜又不一样，它看上去色彩斑斓。高梓在《工作组长》中写出了这一美景：正是傍晚时候，太阳从西边的山头坠下去，天边的一抹红霞，把屋脊和树梢映成红艳艳的。阵阵清爽的山风，吹散人们身上的辛劳。村子不大，房屋和田地在山洼里紧紧挤着。村前曲曲折折躺着一条小溪，远远就能听见轻微的溪流声响。红艳艳的晚霞、密森森的林子、清亮亮的溪水，再辅之以苍翠的青山，色彩绚烂，美不胜收。

华东地区还有无垠的平原。小说中的平原地势平坦，视野开阔，那里异常爽朗、清新。太阳的下缘静静地楔入平原的尽头，在它的四周匀称地渗布着浅红色的霞光。即将收割的豆丛里，蝈蝈和纺织娘柔和地、断断续续地振着翅膀。

华东地区除了山地、平原，还有大海。大海浩浩荡荡，《小舫公出海》写出了大海变化多端的气候特征。大风过去后，天空浮现出一片鲜艳的朝霞。静静的、蓝蓝的海水上，露出了密密麻麻的一大片红色的帆篷，渔船从天边驶了过来。这是它宁静时的安详，碧波万里。它有时也会显示自身的气势磅礴。《出海》描写了海上波浪翻滚时的情景，海浪像飞起的无数座大山，从四面八方劈打下来，崩裂的浪花发出巨大的声响。渔船旋转着，摇晃着，起伏着，在海浪猛烈冲打下挣扎着。大海表现出狂放不羁的特征，站在了人类的对立面。此时的大海就有了象征意味，它是海防前哨紧张气氛的表现物，大海以自己的特征包蕴着这种氛围，显示出作者的立场。可见，小说的风景描写不是孤立存在的，它融入了创作主体的情感，地方色彩才会显出生气。

与辽阔的海洋相比，华东地区还有灵动的河流湖泊。微山湖的夏天是美丽的。“靠近岸边的浅水地带，是一片碧绿的苦姜、蒲草；湖的深远处水面上浮着野萍和菱角，荷花开得一片粉红，一眼望不到边。满载鲜鱼的渔船从荷花丛中穿过，渔人在飞行的小舟上，可以随手摘莲蓬，剥鲜嫩的莲子吃。”^①湖面上色彩鲜明，与人相互映衬，烘托出游击队员们愉快的心情。

动植物是风景的有机组成部分，小说的地方色彩离不开它们的身影。譬如，南方雨水丰沛，植被葱茏，福建的茶树成为了小说描写的对象。《青春的光芒》中勘探队员小陆为找到适合的隘口而奔忙于山岭间。他来到这一带山区后，喜爱上了茶叶，好像和它结了深厚的感情。每次上山，见到一丛丛青翠的茶树，他总喜欢摘下一叶，放到手里，轻轻地抚摩着，或者在茶树旁边深深地吸一下香气。郁郁葱葱的茶树，美不胜收。美丽的景色使小陆更加热爱这片山区，增强他为山

^① 刘知侠.铁道游击队[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340.

区做贡献的决心,小说的主旨得以进一步彰显。再如,在反特题材小说中,苍茫的大海上,海雁(燕)在水天间翱翔。“一群海雁打他们头顶飞过,‘哇哇’叫了两声,把老直吓了一跳。‘快摇吧!这叫声也是阴森森的’”。^①海雁(燕)的叫声令人胆寒,为特务活动营造了空间,小说的情节得以进一步发展。这些描写使得地域色彩更加鲜明。

小说中这些各具特色的动植物,无不打上了作者的情感烙印,同样写海鸟,不同的作者融入了不同的情思,地方色彩显示出的审美感受也不一样。“碧蓝的海水像一片油液,光亮、沉重、平静。雪白的海鸟划破波浪,成群的飞过。”^②结合上下文看,这里的海鸟给人的美感体验是悲凉的。其原因在于,此时观看海鸟的翠荷正在海边盼望家苗回来,但是家苗久盼不归,翠荷只能无奈地等待。“雪白的海鸟成群的掠过静静的海面”^③,这里的海鸟是战胜敌人后作者所描绘的风景,其美感体验是欢快的。仅此可见,这些动植物是烙上作者情思的地域风景画。

天气也是一个地区风景的组成部分。小说描写台风、海潮等天气情况,显示出华东地区的地方特色。《老盐民和新乡长》描写了海潮来袭的状况。九月,海潮一潮比一潮大,白茫茫的一片海水,像万马奔腾似的从海坪上飞卷进来,一会儿就包围住了西墩围,浪涛一个接一个地想爬到堤顶上来……汹涌的海水已迅速地冲进来,马上就要淹到盐坎了。汹涌的海潮势不可挡,破坏人们的生活,无畏的群众和海潮进行殊死搏斗,保住了大堤,使盐场免受灭顶之灾,人们在同甘共苦中加深了对彼此的了解,击垮了阶级敌人的阴谋诡计。海潮成了推动情节发展的工具。最为恶劣的天气条件是台风,在陆地上它破坏群众的生活,房屋、农作物都会遭到毁坏。在海上,台风可以掀起巨浪。《在梅港的晚上》描写了台风来临之前的景象。海水猛地变得浑浊起来,大浪汹涌着。台风阵阵叫啸着,乌云四起,草地上掠过一片片阴影。小说描写了台风肆虐之时的蛮横粗野的力量,让人心生敬畏。乡长贵深还在四处奔忙为群众服务,小说借台风塑造了一心为民的人物形象。

除了海潮、台风,华东地区还多雨。《魏占山》《乔迁记》《永生》等小说都描写过雨景。暴雨来临之际,雷电交加的情景令人心惊胆战。“忽听得砸的一声,一个雷响,接着,一个电花,屋瓦上滴滴答答的下起雨来。……只见一卷卷

① 林群英.水鬼[J].文艺月报,1955(12):13.

② 何飞.小舢舨下海[M]//何飞.我的大姐.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6:13.

③ 何飞.出海[M]//何飞.我的大姐.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6:35.

的黑云淹没了山尖，雨点正劈头劈脑的打了下来。……雷声吼震着山谷，电花像火箭一样的横穿过天空。……房子里，雨水像无数根白线，从屋瓦下滴漏下来。……山脊上，雨水冲荡着稀松的泥土，汇合成一条小河，顺着斜坡，滚滚的流过堂屋后，绕着墙，顺着石阶，往山脚流去……”^①地动山摇的气势摄人心魄。山雨也为贫困的山民即将搬迁到地主的老屋，告别破旧的房屋提供了颂扬新社会的契机。魏占山去溪坪县工作途中，也适逢大雨。暴风雨同一阵阵浮过的雾气，把整个山谷都蒙蔽住了。山壁上，雨点冲下了红色的泥土，又像无数条红色的小河，纷纷横泻过山道，朝山脚流去。小说描写出暴风雨肆虐的情景，溪坪恶劣的天气凸显出县长爱护下属、一心为公的良好品质。《永生》中描写了战士行军时遇到暴雨的情景，尽管天气这么恶劣，可是战士们并没有退缩，他们仍然冒雨行军。“……强烈的风陡然在远处吼起来，树儿都骚动起来。粗雨点猛击起来，倾射的淋注着，打在人的脸庞上痒痒作痛。突现在眼前的闪耀着的碧蓝色的电光，划破了黑暗的天空，显出了山岗上一长串人影，如同在大海的浪峰上跳跃着。”^②鲁中山区风雨交加的天气突现在读者的眼前，惊心动魄。特定地域的天气情况使小说呈现出鲜明的地方色彩。

二、风俗画的展示

“‘风俗画’是指对乡风民俗的描写所构成的艺术画面。风俗是特定社会文化区域内历代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或规范，人们习惯上将由自然条件的不同而造成的行为规范差异，称之为‘风’，而将由社会文化的差异所造成的行为规则之不同，称之为‘俗’。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就很恰当地反映了风俗因地制宜的特点。”^③这段话能阐明华东地区乡风民俗的成因。华东地区多样的自然条件和多变的人文环境造就了这个地区多姿多彩的乡风民俗。小说中主要描写生产劳动风俗、信仰风俗等风俗画面。

地理环境影响着华东地区迥异于其他地区的生产劳动风俗，尤其是沿海地区更是不同于内陆地区。小说中的华东沿海地区的海上作业、卤水扒盐等劳动风俗，具有浓烈的地方特色。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华东临海地区，老百姓世代与大海打交道，向大海讨生活。不管世事如何变幻，临海地区人们的生产劳动方式都保持着连续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号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生产劳动处于重要的地

① 何飞. 乔迁记[J]. 小说, 1951, 5(6): 36.

② 郭凌青. 永生[M]. 上海: 新文艺出版社, 1953: 40-41.

③ 丁帆, 等. 中国乡土小说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23.

位，华东地区小说对此进行了形象化的描写。其中，海上作业成了必不可少的描述对象。小说没有简单地成为生产劳动的传声筒，而是将它融入具体的事件中，通过粗犷强健的渔夫展现出来。家苗一直向往出海，终于等到这一天。奶奶忧喜参半，送他出海。小说用全知视角描写了出海时的盛况。“海上刮着大风。洪尧坐在舵板上望了望天，就向舢子船上的守船人大声叫着：‘嘿！风来了，开哟！’……喊声刚落，跟着，六十三对渔船上的老舵工一齐叫了起来：‘开船罗！’‘风来了，快哟！……’海上一片呼喊声，淹没了风声。海震动起来了。密密麻麻的桅杆中，渔船晃动着。‘扯篷！’洪尧大声叫着，……拉起锚，收起鱼网，扯起头篷，扯起中篷……海浪带着咸味，猛地跳起来，打到人们身上，……风吹弯了帆篷，舵手忙掌住舵。舢子船靠拢过来。呼喊声没有了。海上又响彻着一片风声，交织着巨浪崩倒下来的破裂声。舢子船舢母船靠拢着，一对对的驶出海去。”^①出海的气势在为渔夫壮行，但是大海凶险的面相也隐约可见。正因为狂放不羁的大海超出了人的可控范围，所以人们对它产生敬畏心理，希望能有超自然的力量护佑人类，以保平安。为了寻求外力保护，渔夫们在生产劳动中形成了自己的风俗习惯。尚政的《海上捉匪记》描写了出海的民俗习惯，夕阳放出金光，已是黄昏时候了。阮大碰所在的互助组的“三桅船”正准备出发，扯帆的、起锚的，忙成一片。组长阮大碰和另一个老汉添才，在船头上燃放爆竹，他们悄悄地脱下头上的网帽子，手拿三炷香，望着大海两边默祷了一会。这几年来，他们虽然不大信神了，但一时还不能完全革除那世袭下来的旧习惯，甚至船上的小伙子们，要去执行对敌斗争的任务时，也是如此。小说没有具体记叙渔夫们信奉的是哪位神仙，但他们虔诚的心态是不容置疑的，甚至年轻人也不例外。这一生产风俗表现出福建沿海渔民敬畏大海、祈求平安的心理状态。

除了下海捕鱼，制盐也是沿海居民的生计之一。华东地区小说描写了制盐时的风俗习惯。对于不熟悉沿海生活的读者来说，小说充满了异域情调。《盐场上的脚印》描写了制盐的风俗。“这里是我所要去的盐场。我首先看到的，是一个中年以上的妇女，吃力地佝在大卤桶上戽卤水，半天一勺，半天一勺，显然卤桶里的存量已经很少了。等戽满了一担，她又懒洋洋地挑到地基中间去，倒上晒板。一个青年男子，披着一件沾满湿泥的长棉袄，双手插在腰里，用脚踩踩她家干燥的漏说：‘漏里得趁天晴换泥。不换泥，卤水哪里来？你现在光挑卤水，卤水挑光了怎么办？……’再过去，聚着一大群男女，男的在挑泥、挑水，女的在

^① 何飞. 小舢公下海[M]//何飞. 我的大姐. 上海: 新文艺出版社, 1956: 12-13.